



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论纲

OUTLINES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金碚◎著

深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
科学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方向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论纲

OUTLINES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金碚◎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纲 / 金碚著. —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454 - 5157 - 3

I. ①供… II. ①金…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改革 - 研究 IV. ①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8814 号

出版人: 姚丹林

责任编辑: 王成刚 易伦 甘雪峰

责任技编: 许伟斌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 12 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兴旺路)
开本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286 000 字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 - 7 - 5454 - 5157 - 3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8306055 37601950 邮政编码: 510075

邮购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7601980 营销网址: <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新浪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gebook>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言 关于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 供给体系的经济理论研究

2016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确定为国家经济对策思路的逻辑主线，也成为经济界和理论界的一个被广泛关注和热议的话题。一时间，对各种经济问题的讨论，特别是涉及经济战略、政策、改革等重大现实问题时，几乎是人人言必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人类经济生活的延续归根结底是要依靠供给的创造力：即依靠劳动生产力，依靠资源利用，依靠技术进步，依靠推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各种要素投入和有效配置。在经济学范式中，供给体现了创造性、生产率、竞争力。人类对产品的需求和需要，都得由供给的质量与数量来满足。经济活动中一切基于资源配置的创造力，尤其是各种创新因素，几乎都包含在供给体系和过程之中。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供给体系归根结底发挥了两个作用：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供给的力量就是基于资源配置的价值创造功能。在一定的经济体系中，资源配置追求有效性，价值创造追求合意性。前者以科技为本，有学者说，科技也有生命（美国学者凯文·凯利称之为“第七种生命”），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资源有效配置取决于科学水平与产业技术状况，甚至决定何物为“资源”也必须以一定的科技发展水平以及由其决定的产业技术水平为前提，所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资源有效配置就是最大限度发挥生产力的经济优化状态；后者以人为本，所谓价值，既是物对于人的关系（有用性），更是以人与物的关系所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财产性）。适人所需，合人所欲，是价值之本。当然，供给不是独行侠，进行资源有效配置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和市场需求，创造价值也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或欲望，所以，供给体系发挥其基于资源配置的价值创造力量，同需求、需要、欲望等也须臾不可分离，离开后面几点，供给也会变得无意义（正因为如此，经济分析

中才把需求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这样,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就触及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根基:价值理论与供求理论。只有基于对经济学最基本原理的理解,才能在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知之所云。

因此,本书的主题不是讨论具体的现实经济问题和政策举措,也不试图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和规划方案,而主要致力于研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的基础性经济理论,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学理逻辑和基本思路。也就是说,本书以“探个究竟”和“话说到底”为求索指向,力图在较高的理论抽象度和较深的思考层面上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尽可能不涉及具体领域和各行业的实际操作性问题。当然,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具体实际,经济学归根结底是致用之学。而且,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战略对策性意向,而不是一个形而上的理论思辨命题。所以,本书虽然是一部理论研究著作,但所有的论述都立足于中国经济当前的现实情况,即使涉及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政策学派的文献和观点,也以分析中国问题为意向。希望是一部具有“从理论高处俯瞰实地全景”特色的学术作品。由于是一部探讨性的理论著作,因此本书所论述的许多问题都具有可辨析性,不求学界一致同意,但求见仁见智地切磋。科学总是在异议中进步。

基于上述构思,本书第一章从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讨论开始,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研究的国情背景,使全书的讨论更具时代感和现实性。同时,这一章也讨论了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性质问题,为全书奠定价值理论基础。第二章讨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有关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基本概念,为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奠定范式基础。第三章讨论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即深入阐释从需求侧或供给侧着力实施管理或政策作为所依据的学理逻辑,以及经济思想史上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演进过程的基本线索。第四章讨论供给体系和供给活动的价值理性问题,即如何贡献于增进民生福利这一根本目的。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标:从工具理性上说是形成供给动力以满足市场需求,从价值理性上说则是供给终归是为了人的生存、发展和幸福。实现民生价值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福利准则。本书前四章属于第一层面的基本理论问题。从第五章开始,进入比较具体的第二理论层面。

第五章讨论供给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产业,分析产业的基本类型及

其主要特质。第六章研究政府的供给政策，主要讨论政府从供给侧干预经济活动的策略思维及其有效性和局限性。特别是深入讨论了产业政策问题。第七章研究作为供给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企业，这是研究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该章以稍长篇幅讨论了作为特殊企业的国有企业的定位与发展方向，尤其是在推动技术创新和建成创新性国家过程中的独特作用。第八章研究供给体系和供给活动的空间格局，即全球化新时代的区域经济关系，这是中国经济供给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既是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所具有的巨大优势，也是产生各种矛盾和不平衡现象的现实国情条件，需要做深入的专门研究。

最后两章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策的根本归结点和着力点问题。第九章讨论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率问题，提升竞争力和形成创新驱动机制是其根本。竞争关系体现在企业间、中外产业间和地区之间，在竞争中不断提升竞争力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的最终体现。竞争力就是供给体系的生命力。第十章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着力点——改革的机制、动力、目标和改革机理的内在逻辑一致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是一个政策表达，针对的是具体而复杂的现实问题，但却涉及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重要理论和各种政策主张的主要学派观点，是一个内容涉猎极为广泛的研究论题。本书只能从几个主要方面入手，对其所涉及的重要理论进行重点讨论，难以面面俱到实现“全覆盖”。限于时间和篇幅，以及本人的学术水平，也并不奢望达到极致的研究深度。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的推进，以及更多问题的呈现和更多经验的积累，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研究必将不断深入和更加系统全面，进而形成更严谨、更完整的学术范式体系和逻辑构架。也许，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不仅能给实践者以更多有益的启示，而且可以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做出非常重要的学术贡献。

金 碚

目 录

第一章 国情背景：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
一、经济增长的轨迹和经济实质	1
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7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	18
第二章 概念基础：经济学中的供给侧与需求侧	23
一、什么是供给与需求	23
二、供给与需求的多重含义	27
三、经济理论体系中的供给侧与需求侧	31
四、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内在关系	34
五、价格系统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内在关系的关键	40
第三章 学理逻辑：需求管理与供给改革的理论基础	43
一、经济学的学术逻辑	43
二、宏观需求管理的理论基础：“凯恩斯革命”	47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逻辑	58
第四章 福利准则：供给的民生价值	63
一、供给体系以满足人民需要为根本目的	63
二、市场经济实现民生价值的基础机理	66
三、引入分配关切的民生价值	68
四、满足基本需要的民生产品	71
五、民生产品的供给主体	72
六、民生的物质基础与主观幸福价值	78
七、民生的社会价值观	80

第五章 供给体系：产业类型与特质	85
一、创造财富流量与存量的产业活动	85
二、物质财富与人类劳务	90
三、虚拟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93
四、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	96
五、立足现实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100
第六章 供给政策：政府干预的策略思维	107
一、经济理论与政策实务并非同一逻辑	107
二、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作用	111
三、政策干预的可行边界	117
四、经济关系的系统性与经济政策的分割性	125
五、经济政策的公平竞争原则	129
第七章 国企供给：特殊定位与改革方向	134
一、供给体系中的不同类型企业	134
二、国企战略定位与新常态下再定位	139
三、国有企业的创新使命	149
四、通过混合所有制寻求存优除弊的可行模式	155
五、完善国企管理制度与模式	158
第八章 空间格局：全球化新时代的区域经济	168
一、权衡的物质主义时代的地区经济发展态势	168
二、产业发展与区域价值	173
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维	178
四、全球化新时代区域经济新趋势	184
五、影响区域发展的产业文化	193
第九章 供给质效：竞争力与创新驱动	197
一、竞争力研究的经济学方法	197
二、企业竞争力的内涵和要素	202
三、产业竞争力的经济学性质	210
四、发展不平衡的地区间竞争	216
五、创新机制决定竞争力	219

第十章 改革机理：制度便利性红利	228
一、改革的机制决定其成效	228
二、建立避免利益偏向误导的可行机制	230
三、改革红利与经济便利性	231
四、经济便利性与规管有效性的权衡	235
五、作为公共性集体行动的改革	240
六、改革机理的逻辑一致性	243
参考文献	253

第一章 国情背景：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出以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国家经济对策的中心内容和主线，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和形势判断。可以说，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对相互缠绕的概念。经济新常态的最朴素表现是经济增长率的显著变化，即从两位数的增长率趋势性地下降到7%以下，并将继续下降。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背景是经济增长下行“综合征候群”的严峻形势。也就是说，之所以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应对经济增长率趋势性下降的挑战。所以，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从对经济新常态，尤其是对经济增长实质的讨论开始。

一、经济增长的轨迹和经济实质

生活在当代的人们，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长的一代，已经将经济高速增长视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一旦增长率下行到显著低于历史数据例如7%或6%以下时，就认为经济“不正常”了，往往产生悲观和惊恐情绪。其实，“经济增长”并不是人类发展的“一般”现象或大概率事件，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按今天的观念看，经济是长期停滞不前的，几乎没有增长。有经济史学家估计，到18世纪时，全球GDP的年均增长率大约只有0.02%。经济高速增长是一个工业化现象，而工业化只是人类发展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很短暂的阶段。当我们仍然将增长作为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并予以高度关注时，意味着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或者是期望发生新的工业化。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从大跨度时间上观察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的长轨迹和大趋势。他以大量的历史数据再次展示了这样一幅历史画卷：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经济增长极为缓慢；等到进入工业化时期，才发生了高速增长经济现象。而当完成工业化之后，高速增长也将回复低速。也就是说，

相对于工业化时期而言，全球经济增长的历史“常态”是低速或中低速增长。据他的估测，从公元元年到1700年，全球人均产值年均增长率为0。全球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0.1%，这是因为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1%（见表1-1）。

但当发生工业革命后，情况就极大地改变了。从18世纪开始直到21世纪初，即1700—2012年，全球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为0.8%，在此期间，全球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8%，因而全球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6%，这一数字与今天我们所处时期的经济增长态势相比似乎很不起眼，只能算是低速，但却是工业化之前的16倍！其中，1913—2012年，全球人均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6%，全球年均人口增长率为1.4%，因而全球总产值年均增长3.0%。这是一个在人类发展数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现象（见表1-1）。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90—2012年，亚洲的人均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3.8%（见表1-2）。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强有力引擎的突出表现。据统计分析显示，中国在这一时期的人均产值年均增长率超过8%，这在世界经济增长史上是很少见的持续高增长速度。

表1-1 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年均增长率

单位：%

年份	全球总产值	全球人口	人均产值
1—1700	0.1	0.1	0.0
1700—2012	1.6	0.8	0.8
1700—1820	0.5	0.4	0.1
1820—1913	1.5	0.6	0.9
1913—2012	3.0	1.4	1.6

资料来源：【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91页。

表1-2 工业革命以来各洲人均产值年均增长率

单位：%

年份	全球	欧洲	美洲	非洲	亚洲
0—1700	0.0	0.0	0.0	0.0	0.0
1700—2012	0.8	1.0	1.1	0.5	0.7

(续表)

年份	全球	欧洲	美洲	非洲	亚洲
1700—1820	0.1	0.1	0.4	0.0	0.0
1820—1913	0.9	1.0	1.5	0.4	0.2
1913—2012	1.6	1.9	1.5	1.1	2.0
1913—1950	0.9	0.9	1.4	0.9	0.2
1950—1970	2.8	3.8	1.9	2.1	3.5
1970—1990	1.3	1.9	1.6	0.3	2.1
1990—2012	2.1	1.9	1.5	1.4	3.8
1950—1980	2.5	3.4	2.0	1.8	3.2
1980—2012	1.7	1.8	1.3	0.8	3.1

资料来源：【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94页。

托马斯·皮凯蒂以数据分析为基础进一步推导认为，从人类发展的长期过程看，即使全球人口年均增长率保持1%和经济年均增长率长期显著超过1%也是不可承受的，甚至是难以设想的。例如，“如果1700—2012年的平均人口增长率（约为每年0.8%）再持续3个世纪，全球人口总数将在2300年达到700亿”，那将是现在世界人口的10倍，地球绝对难以承受。因此，经济发展“每年1%的增速意味着重大的社会变革”。托马斯·皮凯蒂认为：“过去2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很难以高于每年1.5%的速度保持增长。”“历史表明，只有正在赶超更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中的欧洲或今天的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才能实现以这样的速度（每年4%或5%）增长。对处于世界增长前沿的国家而言——并且因此最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而言——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增长率在长期会超过1.5%，不管采取何种经济政策都是如此。”^①总之，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发达经济体的人均产值增长率将处于1.0%~1.5%的新常态。

^①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83页、第95页、第590页。

可见，工业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独特而相对短暂的阶段，迄今只有短短二三百年。但就是在这—时期，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全部历史的总和。这是由工业的性质所决定的。广义的工业，除了制造业，也包括建筑业等。

人类生存和发展首先依赖于自然，从自然界获取可用之物的生产活动，包括人类通过提供劳动而促进自然过程生产出可用之物，称为人类生产活动的第一次产业，包括采集、狩猎、农业、畜牧业、捕捞业等，即广义的农业。人类通过劳动而使原本的无用之物转变为有用之物，称为工业，包括手工制造业和机器制造业，加上建筑业，称为人类生产活动的第二次产业，即广义的工业。由于采掘业介于第一次产业和第二次产业之间，所以，一些国家将其归入第一次产业，另一些国家将其归入第二次产业。第一次产业和第二次产业之外的生产活动，经济学家将其归类为第三次产业，即广义的服务业。

创造财富的前提当然是大自然所提供的条件，自然资源（自然财富）是人类创造财富的物质源泉，生产过程首先就是人与自然的互动，或者是促使自然过程产出可供人类使用之物，例如种植、饲养等；或者是直接参与物质转化过程，将其加工制造为可供人类使用之物，例如制造业、建筑业等。进入工业化时期，人类以其迅速增长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发掘和使用自然界所蕴藏的巨大能源的能力，将自然物质大规模地转化为（加工制造成）工业品，即可以估价的有用物质财富。人类发展的面貌从此彻底改观。

工业化之所以能够导致经济高增长，基于工业品的两个基本经济性质，一是具有可保存性；二是具有很大的需求弹性。正因为这两个基本经济性质，工业生产使得人们有可能长期保存物质财富，所以使产生强烈的几乎是无限度的“囤积倾向”成为可能。因此，人类以工业技术手段创造物质财富的动力是对物质财富及其积累的欲望。从历史事实看，工业化同资本主义具有内在一致性，工业化为资本主义提供技术手段，资本主义为工业化提供动力机制。资本主义制度将工业生产纳入无限追求利润和积累财富的过程，即马克思称之为“榨取剩余价值”的社会再生产体系。于是，财富欲望成为工业化的强大动因，生产力成为财富增值的工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成为将资源配置于能够最有效创造财富过程的机器。经济学家们以物理学的隐喻抽象化地想象和描述了市场运行过程，刻画了工业化在其中均衡或非均衡地推进

的轨迹。这样，工业化时代就成为财富的时代，工业化轨迹就是财富增长的路径，工业化的历史就成为财富创造和堆积的悲喜剧。工业化生产体系如同一架喷吐财富的巨型机器，它的高速运转，让人类兴奋不已。

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产生了一种“异化”现象，即思维镜像的颠倒：先将原本是人类工具的物质财富视为追求的“目的”，反而把人自身视为“工具”；进而还会把追求只是单纯财富象征之物的货币作为追求的“目的”，而把物质财富视为牟取货币财富的“工具”。这样，原本只是作为交换媒介而本身没有消费用途的货币，反倒成为生产活动的“目的”。但正是这种颠倒，使得经济增长具有无限性，似乎可以不受物质条件和人类实际需要的限制。于是，关于什么是经济增长的观念就变得不清晰了。经济增长究竟是财富创造、价值增值，还是有用之物的增加？人们将国内生产总值即 GDP 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显示指标，那么，GDP 衡量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整个经济体作为一个生产性供给体系所创造之物的经济实质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理论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首先论证了商品价值二重性，即人类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性质。而商品二重性的根源则是劳动二重性，即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及其表现形式——交换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及其表现形式——物品有用性。当我们讨论任何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时，首先必须明确其使用价值和价值（交换价值）关系上的含义，使用价值是商品的有用性，当然应是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工业生产的本质，即“将无用之物转化为有用之物”；而交换价值原本应是手段或工具，即能够依此而换取其他有用之物的凭据。所以，经济增长的初衷当然应该是创造更多有用之物即使用价值。但是，由于上述人类思维镜像颠倒的缘故，对于最常使用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人们往往误以为它是一个关于价值量（或交换价值量）的核算概念，即核算的是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创造了多少交换价值。产生这一误解的技术上的原因是，GDP 确实是采用交换价值尺度（货币单位）核算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发生的经济活动总量。由于它的计量工具是货币单位，例如人民币或美元，因此人们就以为追求 GDP 就是追求（交换）价值增长的成就。

其实，那样的看法是不正确的。GDP 核算的目的并不是计量生产活动

的交换价值量，而是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真实经济量，即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真实产品和服务的总量，也就是可以使用的（通常是发生了市场交换的）产出量，而不是其名义量（交换价值量）。只是由于千差万别的产品和服务的真实产出量必须用一个核算尺度来计量及加总为一个统计总量指标，所以借用了货币单位（交换价值量）作为估算工具。但这并没有改变其实质仍然是核算真实经济量。所以，我们看到，在统计实践中，核算 GDP 增长时采用的不是现价而是“不变价格”，就是因为所要计量和比较的是不同时期内产品和服务的实际产出量，而不是其货币名义量。在进行国际比较时，还可以采用“购买力平价”指标，力求尽可能去除其中的价格因素干扰，更真实准确地核算各国的真实产出量。所以，核算宏观经济活动总量时，交换价值量的意义是不大的，只有真实经济量即使用价值量才有重要意义。

简言之，GDP 的基本经济学意义是：以交换价值计量单位即货币尺度作为核算工具，估算真实使用价值量的生产规模总量及其增长。这似乎有些矛盾，但却是其实质所在。所以，要想科学地认识 GDP，除了关注其价值量（名义量）表现之外，更重要的是应关注其实质量所体现的经济增长真实状况，特别是要关注同 GDP 密切相关的劳动就业的真实状况。要想关注 GDP 的实质量，就要观察和分析构成 GDP 的真实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性质，及其种类、质量、技术水平等，而不仅仅是分析其“值多少钱”。有人估算说，直到 19 世纪中叶（1820 年前后）中国的 GDP 长期占世界第一，当然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却被经济总量远远小于中国的欧洲“小国”轻松打败。事情的关键是，GDP 的名义量与其实质量是有区别的，不可以其名义量取代对实质量的判断。当年，作为“大国”的中国的 GDP 与作为“小国”的工业发达国家的 GDP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小国”的 GDP 是钢铁、舰船、大炮，“大国”的 GDP 是丝绸、茶叶、瓷器，此时计算 GDP 值多少钱，孰大孰小，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就其使用价值而言，那种“小 GDP”显然强于此种“大 GDP”，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关注 GDP 所体现的真实劳动状况就更为重要了。实际上，核算 GDP 最重要的意义是为宏观经济分析建立一套统计指标，而宏观经济分析最重要的意义正在于判断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即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或者如何实现

充分就业均衡，因为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是决定就业状况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提高经济增长率是降低劳动失业率最有效的宏观经济手段之一。而关注劳动状况所要重点观察的是：第一，整个经济体的劳动者是否充分就业？第二，其中，多大比例的劳动者能够在合适的岗位上工作？第三，创新性劳动的活力是否得到释放，即创新性劳动的自由度如何，是否有条件不断创造出具有新颖的使用价值的产品？总之，对 GDP 的核算必须落实到对真实劳动状况的认识和判断上，才具有真正的科学意义。

总之，GDP 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的（交换）价值总量，那实际上只是一个测量值，最多相当于对人体身高和体重的测量，真实体质与之相关但这些数据并非特别重要。重要的是 GDP 所蕴含的使用价值量与质的实体性质。关注 GDP 时切不可颠倒了视角。对 GDP 认识的偏颇，往往导致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误解，对于现实经济中的价值创造特别是创新性劳动的状况也可能误判，更难以进行正确的国际比较。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及国际比较中的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科学认识供给体系所创造之物的经济学性质，对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如前所述，从整个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看，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一个小概率现象，即从物质（使用价值）创造的角度看，如果没有超常因素，例如科技革命、重大产业创新、世界市场的开拓等，供给能力的增长是较平缓的。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由工业革命所开启的工业化时期，是由于供给体系中注入了超常因素，才表现为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即使是在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也是时快时慢，持续数十年高速增长的情况也是不常见的。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三十年之外，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至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约 20 年，世界也算是经历了一个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大稳定”的时期，即经济增长总体增长较快，当然其中也发生过 1997 年亚洲经济危机那样的波折。尤其是在经历了 21 世纪初以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崩盘为标志的所谓高技术产业失势之后，世界经济在 2002—2007 年又经历了一次少见的经济增长黄金时期，除

了日本等少数国家，其他各类经济体包括欧美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大都实现了较高速的经济增长。那时，中国经济更是保持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高速增长势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引擎。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过程被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所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打断。世界经济出现了自由落体式的急速下滑。尽管直到2010年，许多人仍然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下滑只是个周期性现象，只要各国政府联手采取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就可以遏制下滑趋势并使经济增长回到2007年以前的高速增长轨道。各国政府确实也这样做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世界主要国家联手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国际经济危机。刺激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未能迎来所期望的经济恢复和增长，整个世界在大大超出人们预料的时间内处于经济低迷之中。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令世界瞩目，全世界都希望中国能够以强刺激稳住增长势头，拉动全球经济复苏。中国也想不负众望，采取大规模投资的方式“保8”，即力保经济增长率超过8%。后来的事实表明，尽管当时的“保8”和稳增长的刺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避免了断崖式的硬着陆。但这毕竟是一个勉为其难和代价高昂的目标。到2011年前后，中国开始认识到，从过去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下行到7%~8%的速度，主要不是周期性因素所致，而是一种结构性减速，即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性变化，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或经济发展的新阶段，GDP增长指数从2006年的112.7下降到2015年的106.9；国民总收入指数从2006年的113.3下降到2015年的106.3；第二产业增加值指数从2006年的113.5下降到2015年的106.2；即使是增长率最高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也从2006年的114.1下降到2015年的108.2（见表1-3）。在这个新阶段中，发生着一系列全局性、长期性的新现象、新变化。经济发展将走上新轨道，依赖新动力，政府、企业、居民都必须有新观念和新作为。这一切可以被简要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